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

文史资料

选辑

第46辑

张秀熟与四川文史资料·····

金振声

革命开拓我的人生·····

杨岭多吉

朱老总在内江看川戏·····

王德润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记·····

陈德安

参加第五批支援莫桑比克医疗队·····

刘福贞

目 录

政协回顾

难忘王于同志对我的关怀	张惠昌 (1)
张秀熟与四川文史资料	金振声 (3)
革命开拓我的人生	杨岭多吉 (10)
风雨五十载 半世同舟情 ——记陈祖湘	谢学峰 (25)
肝胆相照 患难与共	徐崇林 (36)
不负人民重望 当好政协委员	张永年 (46)
难忘的回忆	朱戒吾 (50)
毫鬓追忆	李宗坊 (68)
我当了十六年政协委员	李富育 (74)
拳拳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蔡绍元 (79)
二十年的变迁	蒋克勤 (85)
以诚相待共风雨	王泰昌 (88)

蜀中俊才

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铜像的来历	汪 毅 (91)
------------------------	------------

为南充教育作出贡献的杨达璋	杨泽本 (94)
蜀中才女黄稚荃	王天华 (100)
著名作家陈铨	陈光勤 (105)
父亲吴一峰的艺术脚步	吴嘉陵 (114)
周总理的保健医师蒲辅周	仇昌仲 (122)
当代儒医李孔定	蒲庆祥 赖显荣 (137)
化学家杨秀夫教授	杨士衡 (142)

故土风韵

朱老总在內江看川戏	王德润 (150)
1959年“中国川剧团”出访东欧	邓学莲 (154)
今日资阳“城隍戏”	徐伯荣 (157)
“中国李庄”	陈代俊 (163)
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记	陈德安 (180)
“邛窑”考古发掘记	陈显双 (191)
安丙家族墓地发掘记	陈祖军 (198)
藏餐味 康巴情	熊四智 (202)

岁月流金

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与孔萨土司家族	孔萨益多 (207)
解押战犯到北京、抚顺的经过	滕华信 (209)
在三线建设的艰苦岁月	吴宝森 (213)
中国大熊猫在爱尔兰展出纪实	钟肇敏 (217)
参加第五批支援莫桑比克医疗队	刘福贞 (223)

难忘王于同志对我的关怀

张惠昌*

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很重要。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成立的，是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事业机关，它的宗旨是敬老崇文，聘任非常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为研究员（后改为馆员）。社会上有些人弄不清它的宗旨和性质，竟把文史研究馆员与一般图书馆、文化馆的馆员等同起来。

王于同志在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对文史馆非常关心和爱护。

省政协全委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文史馆除馆长参加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馆员参加。我长期担任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曾参加省政协全委会达十多次。后因年高出行不便，参加的次数逐渐减少。在全委会上既可听取省的党政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和发言，又可以发挥自己应兴应革的意见，既增加了知识，又认识了很多有学识的朋友。

我今年 92 岁了，自 1959 年起，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把

* 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亲身经历写出来，传之后代，我陆续写了数十篇文章在《文史资料选辑》或其他报章杂志上发表。王于同志鼓励我将写的文章按历史发展进程，次第编排，特别是将从辛亥革命暨四川保路运动起到四川解放这段时期，四川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个册子，以使读者对民国以来四川军政演变，民间疾苦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以便史学家进一步研究探索，写出更好的教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遂遵照她的指示，编了一本《文史拾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王于同志审阅后非常高兴，还与韩邦彦副主席商量，在《四川政协报》刊登了作家李华飞的评介文章——《读〈文史拾遗〉所想到的》。该书经王于同志与省委统战部、省台办、省民革联系，负责销售。台湾同胞杨义富一人便买了200本，该书很快脱销了。有次韩邦彦副主席见到我说：“你那本书史料性很强，我看了。现在我母亲也在看。”我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96年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王于副主席、章玉钧副主席为主编，我被邀为顾问。王副主席多次派人到我家与我研究问题，并把《文史拾遗》作为军政史料参考的提纲。这套360万字的大型史料丛书的编辑出版，可以激起人们爱国爱乡的热情，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深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认识。后来这本书被评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我亦深感荣焉。

张秀熟与四川文史资料

金振声*

我与张老既有世旧之雅，又在他生前领导下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多年，我已年近九旬，对张老之德业，追忆所及，留诸文字，以示后人。

躬行实践 肩负重任

张秀熟担任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曾在一次工作会上说：“四川文史资料工作，过去是我负责，现在也是我负责，今后还是我负责，我还没有找到接班人。”如此庄严、真诚、执着的语重心长的心声，令人感动，发人深思，为什么要负责？向谁负责？负什么责？如何负责？这些需要审问、明辨而后笃行的问题，尽在他肩负重任，躬行实践，激励众志，团结群力，为四川文史资料作出的辉煌贡献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和解答。

他常说：征集文史资料的目的，不是为资料而资料，不是“藏诸名山，秘而不宣”，而是要通过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反映出我国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起

*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伏变化的、生动具体的真实面貌，为历史科学工作者提供研究的史料，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更使我们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科学是文化建设，是提高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做好文史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团结众多的、阅历丰富的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四化事业贡献力量。

张老还说，过去收集资料是从戊戌变法截止到1949年，这是时间的下限。但现在建国已30年，解放初二十来岁的青年，现在都已五十多岁了。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若不及时反复回忆，作出记录，供历史科学者研究总结，供党和政府借鉴，将是一项大损失，将来又会要再来抢救资料。因此革命史资料的搜集，不能只截止于1949年，写回忆录的人也就不尽是老年，这是历史的发展。

这些谆谆之嘱，更见其领导文史资料工作的灼见真知，向党和国家，向历史勇于负责，情见乎辞。

高风亮节 众望所归

张老于1926年就已入党，是位共产主义的先驱，是名威武不屈的革命斗士。

1927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不久是“四一二”大屠杀，次年又发生了“二一六”惨案，反动派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那时张老是党的四川省委委员，后又代理省委书记，他住在重庆，仍然坚持进行革命斗争。由于叛徒告密，在1928年10月张老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在重庆被捕了。

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听说抓到张秀熟，喜出望外，迫不及待

连夜提审，他拍桌瞪眼，想把张老镇住，使之屈服。但是，王陵基被张老一阵嬉笑怒骂后，便狼狈不堪地草草收场。

几经筹划，王陵基又安排一出“公开审讯”。当公审之时，张秀熟义正词严，侃侃而谈，王陵基却是理屈词穷，乃至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张秀熟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将王陵基的反动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且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这件事当日曾轰动重庆乃至全川。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刊登了整版的专栏报导，醒目的木刻标题大字就是《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杀人不眨眼的王陵基，此时，威风扫地。

秀熟张老，高风亮节，学识宏博，志虑忠纯，他把充沛的革命热情倾注于教育文化事业，硕果累累，作育人才，桢干辈出。因此，当他动员各界人士为四川文史资料撰写回忆录，搜集发掘材料时，无不解除顾虑，真诚响应，有的在百忙中挤时间写回忆录，有的老病缠身，请人笔记亲身经历，更有的是把多年秘藏不宣的、第一手的珍贵材料贡献出来。

如已故的刘光烈（号亚修），早年任四川省府的政务厅长，为省长熊克武派往京沪等地与南北政要秘密联系的代表，他提供了当时熊与南北政要的来往密电密函，史料价值很大。1917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1918年又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发动“靖国之战”时间仅半年多，但战火蔓延全川，甚至扩及陕西、湖北。战争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所受灾难异常惨重。孙中山痛心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靖国”的实质。

勤慎将事 细谨不苟

张老对于文史资料的搜集发掘、组稿征稿、审稿、编辑、出版以及整理保管等工作，事必躬亲，细谨不苟，拟定计划和具体要求。

如写回忆录，目的是为写国史写地方史所用，史料是不分大小的，历史记载决不能划分等级。管理资料需要进行科学的分类、编目、建立资料卡。编辑出版文史资料专辑，有其特点，但专辑读者面窄，需要系统化，专题化的著作，以应读者之需。特别对于选稿、审稿，更为勤慎，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原则，以防粗疏之过。

如1978年编辑出版《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即“解放四川”的专辑时，在选稿、审稿中，有一份资料，是国民党72军的师长肖烈所写的在川南起义的回忆录，此稿字迹潦草，枝蔓不清，漏洞百出，又缺乏实质性内容，初审者提出意见，建议不予选用。张老复审该稿时，所获印象亦如上述，但他并未罢手。张老的工作相当多，白天应接不暇，他就用夜晚继续细审肖烈写的那份回忆录。时值寒夜，他坐在床头，下肢偎着棉被，在灯光下细审资料，几经疏理，从漏洞中发现问题，再找作者口述解答，复经查实而后成文，由张老命题为“确保叙泸与宜宾起义”，即予发表。这份资料很重要、很真实，它有力地证实了蒋介石逃离大陆前，企图保住西南的战略计划中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件事，曾被文史资料工作者征、审资料引为范例。

实事求是 写人写事

张老要求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写人写事。他常说，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二者是统一的，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必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写历史事物，要认识所有历史事物都是人的活动。所以写历史总离不开人，把人物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认识概述，不能离开历史条件来论人。任何历史事物，都离不开要写人物在其中的活动，也必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评价。离开了历史条件来评价，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那就会对人的看法是好的就绝对正确，从生下来到老死都正确；而坏的就是天生的坏人，这就是脱离了历史条件来看问题。人在社会中生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共性，除共性外又还有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没有发展，就说不上创造发明。我们文史资料工作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如写人，就要对他好的写成好的，错误的还写成错误的，不能坚持一点，不计其余。“人无完人”，写人要不夸大，不缩小，分寸毫厘之间写得必须很准确，还要结合他们心理状况，还要考虑到他们在当时的处境，按照他们在当时的情况，能做出一些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就难能可贵了。

已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披露了相当多的史实，出版发行后得到社会认可，发挥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显示出写人写事都是实事求是的。例如：1949年9月2日（农历闰七月初十），重庆的“九二”大火灾，灾情空前惨重，震惊全国，为世人瞩目。据重庆市政协提供的资料反映，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火灾，是“美蒋特务计划放火，烧毁重庆物资，并为大肆杀害和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借口的政治阴谋”。

复经广泛、深入、缜密地调查研究，终于查清了重庆“九二”大火灾的真相。据重庆市公安机关调查的结论：“九二”火灾并无政治背景，纯属不慎起火。由于市政建设毫无规划，市外

房屋布局凌乱，棚房比比皆是，市内供水范围狭窄，消防设施简陋。“九二”大火的起因虽然属于不慎，但最终酿成大灾，实乃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所造成。

在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中，有的是在国内外学术界久负盛名的学者专家，有的是在教育文化界贡献卓越的耆宿大师，有的是济世活人着手成春的爱国医家，他们中许多在十年浩劫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含冤而逝。由于文史资料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卓越贡献，高尚的人格，爱国精神，如实地作了记叙，并在政治上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这不仅发潜德之幽光，更使他们的亲友后代为之欣慰，引以为荣，从而荡为热情强力，贡献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

节俭奉公 以身作则

张老是个高风亮节的人，自奉很薄，是毋庸多说的。大家的居住条件都有所改善，逝世前好几年，他却仍然住在一个很古旧的小楼里，冬天很冷，没有暖气，他只得烤木炭火。我常去那里和他研究工作，一进屋子就感到烟灰炭气难闻，然而还是不暖和，使人不好受。他却满不在乎的样子，和我聚精会神地研究工作。以他的资格，他的高龄，那里要不到一套好房子？他却从不开口。文史资料的稿费定得很低，那时每千字2~7元（最低的是笔墨费），都要由张老召集文史委员开会评定，为了增减一元钱，也要再三斟酌。这些评稿委员，多系高龄名流，开会大半天，除了清水一杯而无任何接待。可是张老在威远县政协组织特赦人员撰写的资料中，发现有的特赦人员生活有困难，他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问题得到解决，体现了党的政策，也调动了特赦人员为祖国贡献力量的积极性。

张老从不参加大小会议的筵席，常以用过的信封翻面写通知或写审稿意见，作为稿笺用，绝不浪费公家一张纸。他不允许他的家属用公家配的小汽车去办私事。他有时病了住医院，只要稍有好转便立即出院，以免多耗国家医药费。

还有一件使我最为难忘的事，就是1983年秋末冬初，我省组织了一些高干去福建沿海考察观光，并在鼓浪屿小住数日。他是空手而去空手而归，毫无箱包之累。当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看望他时，只见其精神矍铄，喜形于色，谈笑风生，讲述祖国海疆的新貌，边说边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塑料袋，其中装了几十颗五香胡豆，随手给每个去看望他的人抓了三五颗胡豆，口里说道：“这一小袋胡豆，是我在鼓浪屿买的，它是当地的特产，慢慢地嚼，也别有风味，请你们分享。”

张老的父亲，号润之，是我的老师，我在少年时一直在他的门下受教，他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道德夫子。我在润之夫子的亲炙下，读诵四书五经，他常常给我们讲授颜回的德行，勉励我们要学颜回的“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好学不倦的高贵品德，要我们希圣希贤，立定志向，努力学习。从而联想到张老的淡泊、宁静、蔬食、布衣、节用、爱人的美德，既孕育于家学渊源，又磨砺于革命斗争，得以显其高风亮节，为人景仰。

革命开拓我的人生

杨岭多吉*

我的家庭与童年生活

我从襁褓中父母就带我到父亲的老家——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雅县香堆区，在这里我度过了八年的童年生活。我热爱这片热土。这里有父母的疼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是我放牧、玩耍的地方，我至今眷恋那不知忧虑的童年的幸福，感到十分亲切。然而，我印象更深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常常见到藏军的施刑，村上头人的扬鞭，寺庙的威严和打骂，我无处不弯腰曲膝，使我幼小的心灵每天处于惧怕和紧张之中，我又恨着他们。这一切使我处在既热爱故乡又痛恨故乡豺狼的矛盾心情之中。

我八岁那年（1939年），父亲不堪西藏社会奴役的重负，携全家逃回西康省的老家巴塘县。这里是被外地人称为“高原江南”的地方，山水秀丽，气候宜人，堪称康巴南部的鱼米之乡。这里有一个团的国民党驻军，有国民党县政府的血腥统治，有美国势力的耀武扬威，还有当地土官的欺凌。但是相对来说，这里又比农奴制的察雅县感到宽松一些。巴塘也有一些善良的汉族商

* 四川省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

人、居民，他们早就同当地有亲密的姻亲关系，汉藏矛盾几乎无存，民族关系融洽。这里也是浓厚的汉藏文化交汇处，学校有藏文、汉文，有时还从外国人那里听见英语，从赴印藏的商人那里传来异国异域风情。我从察雅县回到巴塘，就标志着我的人生道路的决定性选择。就是说，如果我在察雅县再住下去，注定会送去寺庙当个小扎巴（和尚），而到巴塘，就走向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道路。

我家共有五口人，家中一贫如洗，无房地产业和牲畜。后来父亲在巴塘县政府求得一办事员之职，有微薄的薪俸，成为全家主要生活来源，但时间不长。

父亲伊埃（杨永安），藏族，有初中汉语文化程度，写一手好字，十分重视送子女入学读书，望子成才心切，对我青少年时期的学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亲为人忠厚，勤劳朴实，恭俭让人，他于1960年困难时期辞世，享年55岁。母亲巴桑翁姆，性情贤慧，勤劳苦命，终身为他人帮农活，1949年被土匪枪杀于深山，享年45岁。我一直读书，姐妹均终身务农。我现在的家庭也是五口之家。1954年，同彝族干部曲木·阿英结婚，她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曾在共青团四川省委、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多年，从事宣传工作。我们结婚以来，她同我在西康、成都、甘孜、阿坝、西藏工作，足迹遍布雪域。我有二男一女，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现子女都已成家。我家是民族团结之家。

启蒙的师范生涯

1945年我14岁，就读于巴塘历史上第一次开办的“国立巴安（塘）师范学校”，学习现代师范学校的所有课程，还加设藏

文课。以汉语文教学为主，并学英文、藏文。经四年学习，于1948年结束师范生活。

知识把我带进了文明殿堂之门，我特别爱好中华古代圣哲先贤和民族英雄们的文章、书籍，除正课外，熟读了四书、《古文观止》，对孔子、孟子、司马迁、屈原、苏东坡、李白、杜甫、陶渊明、文天祥、韩愈、曾国藩等等的文章和书都感兴趣。对汉学的博大精深，对中华历史上的先贤圣哲和英雄人物忧国忧民、为社会、为百姓的精神，颇为崇拜。读书明理，初步懂得人活着不仅为自己的生存奔忙，同时还要爱国，要为他人、要修身、要有民族气节、忠于国家等道理。然而，由于旧社会世衰道微，民不聊生，我读了十年书，走上社会没有工作，生活无着落，当过店员、制革学徒、砍柴工等无报酬的雇工，个人前途仍然渺茫。我在学校里受时事政治影响，也产生了要求民族解放、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歧视的要求，萌发了一定的民族觉悟，开始关心本民族的未来。这是民族觉悟之开端。师范四年的学习，是我一生中打知识基础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为今后的前程铺平了路基。这在今天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旧社会一个藏区的穷孩子来说，是来之不易的。

革命开拓人生

1949年9月，我参加了由中共康藏边地工委领导的进步青年革命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东藏民青”）。“东藏民青”前身是“东藏人民自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塘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1949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五〇年四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团员。”^①关于“东藏民青”，小平同志说：“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②“东藏民青”在巴塘城秘密发展并积极开展了活动，整个藏区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它的主要负责人是多年从事革命活动的藏族青年平措汪杰、昂旺格桑和刀登等同志。我于9月参加了“东藏民青”，同年11月参加中共巴塘地下党，1949年11月“东藏民青”由地下转为公开，并举行五星红旗升旗仪式。我担任“东藏民青”第三支部副书记和第四党小组组长，并在组织内参加学习，宣传革命理论，进行发展组织、武装防卫国民党的残匪、搜捕美蒋敌特、准备迎接巴塘解放等革命活动。

自我参加革命开始，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感到我们民族和个人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过去的一切消极和悲观全部扫除干净。我通过学习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对党有了初步认识，知道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穷人才能翻身解放的道理。

1950年3月，根据康定地委通知，“东藏民青”总部动员自己的成员去康定听从分配，近六十名成员立即奔赴康定。根据当时解放西藏的需要，绝大多数同志分配去参加十八军进军西藏。我们七八个人留在康定并立即去雅安的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后改名革命大学）学习，学习了半年的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和唯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物主义观点，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知识，开始同宗教观念决裂。当时，同学们都要求立即回去搞土改，打倒地主，我们这种想法，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教育和纠正，指出藏区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团结上层而不是打倒，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要土改，并且叫我们学好民族政策，从而树立了民族政策观念，也懂得团结上层的新道理。这是这段时期思想上的大转变和进步。

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中锻炼成长

由于清朝时赵尔丰对巴塘的血腥屠杀镇压，驻扎巴塘的美国人的耀武扬威以及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反对汉人、洋人统治压迫的民族对立情绪油然而生。藏区社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不信任心理严重存在，民族矛盾成为解放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矛盾。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党中央提出民族地区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些方针政策，解决藏区的主要矛盾，1950年10月康定藏族自治区召开了全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我以“东藏民青”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东藏民青”的活动情况。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全区（州）自治政府。康定藏族自治区是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藏区。省和地委提出了团结民族上层为主的方针以及在此方针下开展生产、治安、建政、培养民族干部等工作。11月，组织派我们第一次到藏区县上开展各项工作，并建立县级政权。回顾1950年5月～10月去雅安西康人民革命大学（西干校）学习时，我刚学习了阶级斗争的一些理论，便满脑子的改革思想，想回县立即打倒藏区的地主、头人、上层喇嘛。而按照当时康区实际情况，却要实行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思想上是个大